

July 2014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Writing in Modern fictions and Its Significance of Fiction History: With a Focus on Shanghai and Guangzhou

Daqing Deng

Xun Su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Deng, Daqing, and Xun Sun. 2014.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Writing in Modern fictions and Its Significance of Fiction History: With a Focus on Shanghai and Guangzhou."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4, (4): pp.128-135.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4/iss4/22>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近代小说城市书写的变革及其小说史意义

——以上海、广州为中心

邓大情 孙 逊

摘 要: 鸦片战争的失利,迫使清政府开口通商,以上海、广州为代表的一批由进出口贸易带动起来的新型商业贸易城市随之兴起。这些城市所形成的新结构和新功能,打破了中国传统城市的旧模式。作为与城市关联密切的一种文学样式,近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亦随之呈现出相应的变革。城市书写的空间不断拓展,由对城市地标建筑的笼统书写发展到进入城市肌理的各种生活细节。小说主角由传统市民向近代都市人蜕变,而在叙事形式上则呈现出从注重时间维度到以空间为中心的转换。近代小说城市书写的这些变革,成为都市小说由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具有了一种承上启下的小说史意义。

关键词: 近代小说; 城市书写; 变革; 小说史意义; 上海; 广州

作者简介: 邓大情,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城市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电子邮箱: tmr8112@163.com

孙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都市文化研究。电子邮箱: sunjuyuansun@hotmail.com

Tit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Writing in Modern Fictions and Its Significance of Fiction History: With a Focus on Shanghai and Guangzhou

Abstract: After the forced opening of such cities as Shanghai and Guangzhou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traditional modes of culture in these cities were changed. Fiction, as one important literary gen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urbanity, also underwent transformations in terms of the urban writing in China.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s, the space of urban writing was continuously extended, with the descriptive focus shifting from the general coverage of landmark buildings to the detailed exploration of urban life, the protagonists shifting from traditional city dwellers into modern urban citizens, and the narrative form shifting from centering round time to centering round space. These changes in urban writing can be read as the bridge between the ancient to the modern in Chinese urban fictions, and they hold remarkable significance in the tran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s.

Key words: modern fiction; urban writing; transformation; significance in fiction history; Shanghai; Guangzhou

Authors: Deng Daqing, Ph. D, is a lecturer in the School of Urban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oshan 528225,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ing o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tmr8112@163.com

Sun Xun is a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ing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urban studies. Email: sunjuyuansun@hotmail.com

中国小说与城市关系密切。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小说的发生和发展,而反过来小说又可以生动地再现城市的生活场景。通过小说之笔

触,中国古代之长安、洛阳、汴京、临安、北京、南京等城市无不鲜活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及至近代,伴随着中国大门被打开,外国各种新事物潮水般

地涌入,从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城市的生活。中国延续了千百年的以农业为基础、农村为主导的城乡一体传统城市格局被打破,出现了以广州、上海为代表的一批近代意义上的新型商业贸易城市。这两个城市虽然名称古已有之,但是它们在近代的发展,早已超出旧有的格局、功能和形态。因此体现在近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无论从内容到形式,较之于古代小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从城市地标到城市肌理: 近代小说城市书写的空间拓展

在中国古代传统小说中,其城市书写多为写意式的笼统刻画,因此从小说展开的城市地理空间来说,往往会集中在具体的几个点,正如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小说中真实的地理空间描写,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往往以城市地标为主要对象,围绕着能够代表城市特征的地标性建筑展开故事情节”(孙逊 刘方 162)。这些城市地标是城市的名片,它浓缩了城市的形象、内涵和气质,反映出一个城市最独到的文化韵味。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唐人小说中的曲江,宋话本中东京的金明池、樊楼,临安的西湖,以及明清小说中南京的秦淮河、苏州的虎丘、扬州的平山堂等。许多古代小说都以城市地标作为故事发生和展开的背景,强化出这座城市的个性形象、文化传承和精神气质。

古代小说城市书写抓住地标性建筑重点描画的处理方法在近代小说中有所继承。例如上海的四马路、城隍庙、龙华寺,广州的珠江等,它们都是两个城市中最富有代表性的城市地标,所以在近代小说中仍然是描写的热点。如“笙歌彻夜,灯火通宵”的上海四马路,不仅市面商业繁华,而且还是上海最著名的红粉街,甚至成为当时全国城市青楼业的一个标杆。城隍庙、龙华寺也不再是单一的宗教场所,由于信徒众多,来往烧香络绎不绝,它们又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不过随着近代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以及城市功能的转换,近代小说城市书写在空间处理上较之古代有了不小的变化。具体言之,小说书写已经不局限于对这些标志性城市建筑的集中刻画,而是在书写空间上大大扩展,渗入到整个城市的肌理,从而真正走进都市社会的各个角落,抓住生活的各种细节。

近代小说敏感地把握住了城市功能的转变,凸显商业都会的特征。以上海、广州为代表的一批商业都会城市,其政治功能已大大弱化,明显区别于古代长安、洛阳、汴京、临安、北京、南京等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的城市。这种改变反映在近代小说的城市书写上,它已经不再像古代小说那样着重铺叙都市中皇权的威仪、官宦的排场以及城墙的雄伟等,而是集中描写商业都会中各种富有现代特征的城市新景观。例如以《新上海》、《海上繁华梦》、《十尾龟》、《痴人说梦记》、《海天鸿雪记》等为代表的一批小说,它们描画上海这座现代商业都会,已经不满足于以往那种浮光掠影式的叙述或是地标式的点画,而是具体到各条街道以及各个景点,以浓重的笔墨书写都市中的繁华景观。如上海的三马路、宝善街、棋盘街等,无不是市面商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可谓是“说不尽夷场风景,描不尽海上繁华”。而《廿载繁华梦》、《自由女》、《发财秘诀》等小说,同样生动呈现了一个“商贾云集,百货流通”的热闹广州。

广州、上海作为重要贸易港口的性质在小说中得到体现。两者在古代就与国外往来密切,近代又同时成为最先向西方开放的城市,它们与国外以及国内其他城市的贸易往来更为频繁,其经济辐射能力不断增强。广州在清代曾一度作为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逐渐被上海赶超,其外贸经济仍然不容忽视。在香港崛起后,广州与香港之间的往来更是紧密,以致有了“省港不分家”之说。上海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开埠后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就取代广州成为了全国最大的贸易港口,成为全国的商贸中心,其便利的交通、充足的货源,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小说《负曝闲谈》中甚至把它与伦敦、巴黎、纽约并列为天下最繁盛的四大码头(蘧园 291)。在《新上海》、《市声》、《九尾龟》、《宦海钟》、《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中,还写到了从直隶、广西、江西、安徽、南京、广东等全国各地来上海采购的客商,其置办的商品包罗万象,包括了从洋枪洋炮等军工用品到新式民用机器、精美生活用品、教育文化用具等各类东西,而这些货源的充足正说明了上海在与外洋贸易方面的优势,成为名符其实的国际化贸易中心。

小说还揭示出近代都市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各种细节。首先是市民的生活无论从物质到精神

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由于西方文明的渗透,各种西方的新兴事物蜂拥而入,如雪白光亮的灯光设备、风驰电掣的新式马车、鳞次栉比的番菜馆、标新立异的西方服饰,观者如潮的西式赛马会,开风气之先的新式教育、出版业,以及让国人倍感陌生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等等。不仅如此,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尤其是广州、上海这样的商业大都会,人口流动频繁,传统都市中那种自足性的、相对静止的生活方式被打破,市民的生活更趋于商业化、大众化,趋利的心态更为直接。例如在古代小说中常见到的青楼题材,在近代小说城市书写中仍然火热,出现了《九尾龟》、《海上繁华梦》、《海上花列传》等诸多狭邪小说,但是这些作品与古代相较变化也是明显的,青楼消费由主要面向士大夫群体的诗酒酬唱,变为主要面向商人、中下层官吏和知识分子。这里已不再有唐传奇宋话本等传统小说中的那种才子佳人两情相悦的浪漫,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职业化、商业化,在上海甚至很多的生意都是直接在高档青楼谈成的,充分说明青楼中传统优雅韵味的消失,日益走向金钱和肉欲交易。

其次是近代都市公共空间的开拓。由于人口的急剧膨胀、流动频繁,加之来源复杂,习称之为五方杂处,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移民社会。传统城市的那种分散性、静止性发生改变,与之发展相适应的是,近代城市公共城市空间得到极大的开拓,最典型的莫过于上海,当时的张园、徐园、城隍庙、龙华寺等都成为著名的公共场所。市民逐渐习惯像西人那样去公园游玩,在一些传统的民俗节日,许多活动都在这些地方开展,在《新上海》、《海上繁华梦》、《海上花列传》等小说中写到的上海城隍庙、龙华寺的宗教活动,以及元宵、七夕等节日在张园看焰火,重阳节到徐园观赏菊花等等,这些成为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个起点。

再次,都市引入西方的市政管理模式,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迈进。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城市行政管理中,其核心是朝廷的官僚机构,日常事务由朝廷派遣的官员来主持,治理辖区内的百姓,征收钱粮和实施教化等。但是这种模式在近代同样被打破,当时的广州、上海都有洋人设立的租界,西人在里面自己行使管辖权,清政府无权过问,形成实质上的国中之国。这些租界发展迅速,尤其是上海,其租界面积大幅扩张,洋人把自己本国的市政

管理方式搬了进来,使得租界的面貌发生很大的改变,其影响逐渐推到整个城区。这些管理方式对于传统的国人来说无疑很新鲜,例如当时上海的消防号称甲于天下,在《十尾龟》、《海上繁华梦》等小说中,作家都以一种猎奇的心态对洋人的救火设备进行详细的描述。其实西人的市政管理远不止消防这一点,它是包含了从管理规章的制定与实施、公共卫生设施的创建与完善、公共事业方面的推进与发展等一系列的配套工程。正是因为租界中城市行政功能的转变,使之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推动力,而老城区在比较中则显示出落魄来。在《海上繁华梦》第十九回写老城区中也是园的衰落:“这里也是园原算是城中一个名胜之所,听得老辈中人说起,从前上海没有租界的时候,那些秦楼楚馆,多开在城里头县桥左近,怎么三多堂、五福堂的,很是热闹。每到荷花开放,就有许多狎客,带着他们到这里来顽,仿佛目下张家花园一般。自从红巾扰乱之后,有了洋场,这些堂子慢慢的多搬到洋场上去,城里头遂没有了顽的地方,这也是园也就没人到了”(海上漱石生190)。此处虽然说的是老城区妓业的衰落,实际上也是这里全面衰落的一个缩影。而租界却因为采用新的市政管理,从而成为新生活的中心,也成为近代生活方式的先导。

二、从传统市民到近代都市人： 近代小说城市主角的蜕变

在中国古代,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官府行政。在整个城市的人员构成中,享有特权的官宦士绅阶层是城市的核心人群,其他的商贩、工役、仆佣等虽然人数众多,却主要是为官宦士绅服务的从属性群体。但是在近代以后,由于中国许多城市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以广州、上海为代表的一批开放港口城市,以近代工商业为主体的近代经济职能的增长,使城市的经济内容、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与之伴随而来的是一些新兴的社会群体在这些城市中开始崛起,它在构成上和传统市民阶层发生了质的变化,就拿上海来说:“其中以买办和通事为代表的新式商人,从事金融、商业和实业投资的资本家,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诚实劳动者以及城市管理部门和公共机构的职员和知识分子,都是过去传统市民阶层所没

有过的,他们既是城市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体,也是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孙逊 10)。这种情况在近代的广州等其他一些城市也是类似的,说明整个城市的人员构成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时代变化的必然结果。

城市近代化的结果,促进了城市主角从传统市民到近代都市人的蜕变,而小说中直观地反映了这种蜕变的情况。具体言之,小说描写的重心开始转移,不再像古代小说那样,以传统市民作为故事的主角,而是将更多目光聚焦在这些新兴的都市群体上。内容上亦不再集中描写曲折离奇的公案故事、才子佳人的恩爱缠绵以及市井细民的发迹变泰等,而主要凸显的是新兴阶层在近代商业社会中的生活现状。这些都是旧小说中所欠缺或没有的内容,往下则直接开启了现代文学同类题材创作的先声。

买办阶层是近代小说中着墨较多的人物。他们是中国传统都市近代化转型期中产生的特殊阶级,随着西方势力向中国的渗透而发展迅速。广州早在十三行时代就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买办阶层,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外国资本的不断涌入和国家对经济的日益看重,买办的地位迅速提升,在城市社会领域内的作用更加突出。上海在开埠之初,买办多由外地流入,其中尤其以广东来的居多,王韬曾说:“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8)。通事与买办是近代买办阶层的两种,当时上海的多数洋行是从广州、香港分设过来的,买办自然也跟随外国领事和洋行大班来到上海。随着买办数量的不断增多,在社会上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在广州、上海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这些买办积极地学习西方的各种先进文化,在中西方沟通中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他们懂得西方语言,能够更快地接受各种西方文化,例如很多的买办开社会风气之先,物质生活上全面西化,坐洋车、吃西餐、穿西装,可谓出尽风头,自然地吸引了众多小说家的眼球。在《文明小史》中,发财洋行里的康伯图华总办、美国律师公馆里的翻译谈子英、姚文通老夫子等几人在万年春番菜馆聚会,大谈中西饮食之异。而在《痴人说梦记》中,写贾希仙的叔父子明在海关做翻译,其住处尽显西化色彩:“希仙跟着那人到了上

头屋里,望见里面一色的外国桌椅,中间桌子上,蒙着一块雪白的洋布,那老爷靠在外国皮躺椅上,口中衔着一支吕宋烟,也不立起招呼,叫他在桌子旁边坐了。煤气灯照着满屋雪亮”(旅生 355)。不仅如此,买办阶层对于西人的精神文化也接受很快,既包括看杂技、逛公园、看赛马会等娱乐方式,也包括接受西人先进市政管理思想以及民主平等自由的理念等,推进城市的近代化发展进程。

买办们对城市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方面是他们的经济实力。在许多小说中,都写到买办凭借自己与洋行的关系,利用种种特权和便利的条件,从而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例如《七载繁华梦》中广州苏警诸供职的裕全山铺票公司无力上缴朝廷规定的款子,被迫向洋行借贷,而在中间联系的正是买办岑鹤轩,他所在的洋行有数百万的资金供人来借,并且还规定多借者利息有优惠,苏、岑两人趁机从利息中捞取好处。《黑籍冤魂》中的吴瑞庵则是通过垄断鸦片生意发财。小说中有关上海买办发家致富的途径更加多样,《新上海》中写到一个大买办做房地产生意发财,竟然创下了好几万幢房屋的产业。买办们的这第一桶金可能充满了投机,有些甚至是饱含原始的罪恶,不过当这些买办有了一定的资金后,他们开始投入到实业中来,从而脱离原来的身份转而成为民族资本家。在近代的广州与上海,买办们经营的实业涉足了近代工商业、航运业和金融业等各个领域,成为一股生机勃勃的新兴经济力量。另外,由于他们熟悉西方经营方法和管理方式,所以在推动城市商业近代化转型方面的作用亦很明显。

与买办阶层相比,小说中资产阶级这个群体的情况更为复杂。随着城市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吸引了众多的富商绅宦投资其中,广州与上海两地的民族工业逐步走向壮大,具有一定财产势力的资产阶级应运而生。这个群体的来源十分广泛,有从大买办直接转化而来的,也有的从工人积聚资金而来,如小说《宦海》中的南海人陈连泰从小家境贫寒,跑去香港机器厂当个小工,凭借聪明才智,他掌握了制作新式机器的方法。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他回到广州开了个大钟表机器店,生意不断做大,成为优秀的民族资本家。还有些则是从旧式绅商转化而来,如《黑籍冤魂》中的谢子晋,一向在广东洋行里做生意,后来捐了一个知县,在江苏接连任了几个大县,保举了江苏的候补

知府,因嗜好鸦片被参掉了功名。他虽然不再做官,但是手中还是有些积蓄的,因此委派自己的女婿吴仲勋去上海开办纱厂。《市声》中的华达泉来自宁波,家中世代经商为业。又有棉纺厂领班钱伯廉与申张洋行买办周仲和、华发铁厂老板范慕蠡、茶栈张老四合股收购蚕茧。另有扬州府大富豪李伯正,出身盐商之家,资产数千万金,开茧行高价收购蚕茧,专与洋人做对,后又豪掷资金创建机器织绸南北二厂,又相继建玻璃厂、造纸厂、制糖公司。这些反映了资本家多源性的特征。

资产阶级在城市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据相关的统计资料,资本家的投资覆盖了商业、工业、银行、航运等多个经济领域,他们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以及社会影响力,塑造着城市社会,并推动整个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型。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由于资产阶级自身所具有的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弱点,加之力量也还显得弱小,使其无法真正独立地承担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历史重任。在小说中也描绘了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大舞台,在发展的过程中承受了来自中外腐朽反动势力的双重阻碍,并在这种夹击下艰难地发展。例如《市声》第一回写大巧就劝解华达泉不要跟洋人斗:“如今洋人的势力,还能斗得过吗?杭州的胡雪岩,不是因此倒下来的么?东翁,你那本钱,及不来他十分之一,如何会不吃苦头呢?”(姬文 14)。第三十五回写到的通瀛织布厂,其规模亦不低,达到三百万股本,无奈其生产数量虽多,却销路不畅,外洋的商品抢走了很大市场,再加上很多外商都是直接办厂,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来挤垮中国的企业。就连资产达到几千万的李伯正的南北二厂都是连年折本,差不多支持不下了。

近代都市生产方式的变更一头催生了资产阶级,另一头则产生了工人阶级。在当时的广州与上海这些发达的商业都会,产业工人的队伍迅速壮大,至辛亥革命前夕,上海产业工人的规模已达15万人左右。他们大多数直接来自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部分无业游民,大多文化程度比较低,除了少部分人掌握了熟练的技术外,有许多人都只能在工厂从事一些简单机械的工作,因此所得的报酬就比较有限,小说中对这个群体的刻画,主要是关注他们在繁华的商业都市中生存的艰难。例如工人的薪水问题,这是小说中常有提及的内

容,近代工人的工资水平是比较低的。如《市声》中的大巧,“从前做小工时,总算生意好,每月也只弄到几吊钱呢”(姬文 15)。小说还写王阿大所在的上海某纱厂,总办很苛刻,工价也非常低,“上等的工价也不过块把洋钱一天。其余也有三角的,两角的,一角的,都是自己吃饭”(姬文 25)。工人从早忙到晚才拿到可怜的一点工钱,有时候还会遭到一些刻薄总办的克扣,如第十一回写李伯正织绸北厂的总办陆桐山,故意诬蔑工人只做半天的工,把他们的工资打个八折,引起了工人的强烈抗议:“我们八点钟做工起,直到晚上方歇,如何算是躲懒?你何时看见我们只做半天工?”(姬文 109)。可见工人劳动强度大,但是待遇却非常差,有时工资还不能按时发放。小说中的产业工人实际上就是城市贫民的写照。

在近代小说笔下的新兴势力中,还有倍受世人关注的特殊群体,那就是城市管理部门和公共机构的职员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是城市近代化的产物,其人员分布广泛,层次多样,他们中既有从旧式从业人员转化而来的老职工,也有接受了新式教育的青年。作为新兴的市民群体,这些职员和知识分子大都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业技能,从事的职业涉及商业、金融、运输、教育以及行政管理等诸多领域,尤其是在海关、电报、邮局、新式学校、洋行雇员等岗位,都是城市近代化之后全新的职业。

由于求生手段的变化,都市中的职员群体已经不同于旧式城市中的那些仆役角色,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符合自身情况的职业,并根据其能力取得相应的报酬,因此很多人都注重自身的培训,以此来提高谋生的能力。由于很多工作岗位都跟洋人有直接的关联,所以在当时能否说外语、是否熟悉西方文化就成了求职中重要的筹码。除了一些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人才外,那些喝过洋墨水的留学生成了很多单位的选择目标,这些人由于身上强烈的西化色彩,其形象自然受到了中国文人的广泛关注。为数不少的近代小说对这种新兴群体有所提及和描绘,更有一些作品以留学生为主要人物,对留学生的描写篇幅之多、之详细,是前所未有的。在西方思想的熏陶下,他们首先从外形开始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他们剪掉辫子,脱掉长袍,穿上西装。思想方面,他们也渐渐不同于国人,甚至有人信奉了基督教。由此可见,留学生比

国人更加提倡民主和自由,也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新兴的留学生群体作为在近代小说中出现的一种独特形象,体现出特有的文学史价值。首先,近代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代表着中国初期留学生群体的精神风貌,具有时代性特征。中国开始派遣留学生出洋留学是在清朝末年,这时留学生群体刚刚形成,却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担负着救国图强的重任。这些留学生的身上带着时代的烙印,近代小说恰恰客观描写了一群带有时代特征,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中担任重要角色的人物。其次,近代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浓缩了社会上留学生群体的映像,突出表现了这一群体最典型的特点,所以具有群体典型性。近代小说中出现的留学生都非常有自身的群体特色,而且这种特色相对较为固定,无论是叱咤风云的中国革命领军人物,还是颓靡腐败、不学无术的假洋鬼子,都有其特有的行径和风貌,都呈现出留学生群体典型的形态,从而组成典型的留学生形象。再次,近代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具有文学开创性,这类新兴的留学生形象,为后来“五四”时期大批描写留学生形象的作品奠定了基础,是后期留学生文学的开端。例如鲁迅《阿Q正传》里的钱大少爷,郁达夫《沉沦》里的主人公等等,都是让读者印象深刻的留学生形象,所以说近代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具有文学开创性。

留学生形象产生在近代中国的转型期,也是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知识的时期。他们作为出现在这个特殊时期的小说人物形象,其身上又反映出一定的文化内涵。总的来讲有两个方面:其一,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冲突。鸦片战争惨败之后,中国掀起向西方学习的思潮。留学生是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先驱,他们归国后,与周围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许多格格不入的地方,这些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在晚清小说中频频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确实存在的一种中西冲突状态。其二,反映了晚清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晚清科举制度被废除,中国长期以来“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突然没有了出路,大批知识分子不知何去何从。当清政府组织官派留学生出洋留学,中国知识分子仿佛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通向美好前程的大门,于是出现了狂热的留学热潮。这时,四书五经、儒家经典显

然已经不受用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科学知识的各种新式学科。中国知识分子为了适应时代的转型,也进行了自身的转型。当然,在转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形象,他们不学无术,生活腐化,贪恋钱财禄位,就如《九尾龟》、《新上海》等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由此可见,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形象相当复杂,好坏掺杂。但无论是好的转变还是坏的转变,这与先前的学者形象已有非常大的差别。在近代小说中新出现的留学生形象深刻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形象的转型,具有了很高的文学史价值和文化内涵。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州、上海等城市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以买办、资产阶级、产业工人、公共职员等为代表的新兴社会群体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迅速地站在了时代舞台的大中央,在社会生活中展示出巨大的力量。而近代小说也很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时代变化,完成了故事主角由传统市民向近代都市人的蜕变。

三、从时间维度到空间维度: 近代小说城市书写叙事形式的转换

中国古代都市长久以来基本延续着城乡一体的传统格局,但是到了近代,上海、广州逐步实现城市的现代化转型,这种长久稳定的模式被打破,从而带来一种与过去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飞速加快,社会人员迅速流动,整个都市呈现出多变性、零散化和复杂化的特征。新的都市生存体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发生了显著变化。节奏的加快让时间变得短促,而空间则变得更为宏大,它瓦解了传统的线条式有序化时空观念,时间蜕变成零散的片段,更多地以空间化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都市生活体验的变化以及都市空间特征必然带来文学艺术的相应变革,近代小说作为与都市生活密切关联的文学样式,采用一种以空间为中心的新型叙事形式成为其创作的内在诉求。

近代小说城市书写选择以空间为中心来讲述故事成为普遍现象,这说明作家们在叙事形式上实现了从注重时间维度到空间维度的转换,这是对小说城市书写传统手法的一次重大变革。中国古代传统小说注重时间维度,习惯于展示文本中

的情节结构、性格发展、叙事因果等历时性因素,但是随着近代都市空间体验、都市景观感觉进入小说创作的视域,叙事的空间化成为许多作家建构小说文本的共同选择。这种空间化结构模式,它已经不同于以往的时间化结构模式,是一种追求反复与同一性特征、非线性发展的共时性结构。

在狭邪小说的代表作《海上花列传》中,作者韩邦庆颇为自得于他的“穿插藏闪”之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2)。这种手法的实质就是让几组故事平行发展,穿插映带,首尾呼应,构成脉络贯通、立体交叉的整体布局。袁进先生在分析近代小说都市书写叙事形式的转换时就认为韩邦庆所谓的“穿插藏闪”之法,正是建立一种以空间为中心的小说结构。该小说笔法虽然由《儒林外史》脱化而来,但在结构形式上已是相差悬殊。《儒林外史》是一种以时间为中心的平面式“链式结构”,而《海上花列传》则是一种完全以空间为中心的多线索立体网状叙述结构(袁行霈 陈进玉 446)。很显然,随着现代化都市中空间的扩展和生活的复杂化,以空间化为中心的小说结构更能适应现代都市社会生活。

《海上花列传》中的创作实践证明,叙事的空间化已经开始成为近代小说自觉的艺术追求,并汇聚成一股新的创作潮流。而叙事的空间化成为小说叙述方式的构成主体,它的变化又必然会带动小说在叙事结构、叙事角度等方面的革新。陈平原在分析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模式时归纳说:“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基本采用连贯叙述,在叙事角度上基本采用全知视角,在叙事结构上基本以情节为结构中心”(“中国”4)。这种叙事模式历经上千年的发展,其总体变化却很小。不过到了近代,这种传统的模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以时间为中心的连贯叙述不再一枝独秀,逐渐转化为以空间为中心的叙事形式,而且这种转化同时还促进了近代小说中城市书写在叙事形式上的连锁变化。

首先是叙事结构上对于故事情节的淡化。传统小说作为一种“讲述”艺术,侧重情节变化是其重要特征,但是在近代出现的一些小说开始有所变化,它们在结构上并不一味地以情节为中心,而是呈现多元化的发展。例如吴趼人的《上海游骖录》,作者写游历上海的见闻,中间却借助笔下人物之口来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不管是对于中国的经济问题,还是有关维新派与革命派论争,都是长篇大段式的讨论,大大弱化了故事情节。这样的结构在艺术上当然难说成功,但是它的探索与改变却也是客观的事实。还有更多小说是在情节结构上有意地强调空间变化,对时间则做了淡化处理。小说叙事往往以一个个空间场面的切换代替了传统小说叙事的连续性,情节分散成多个片段。小说空间化的结构模式还体现在小说开始追求运动感,由对时间逻辑关系的关注转为对空间场景变化的关注,这些小说的情节转化主要依从空间场景的转移而不是线性的时间持续。例如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大量笔触伸向大上海的各个角落,作者将情节的发展系于都市内空间的移动,这使得小说的空间感大大增强。

近代还有许多以上海大都市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作者创作的重点已不在强调情节的变化离奇,而是更着意于揭示小说的都市生活背景。这些小说大都缺乏一个贯彻始终的单一情节中心,而是由众多情节单元构成,每个情节单元相对独立地表达着各自的内容。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没有情节上的环环相扣,而是经常在大故事中套着小故事,整个节奏比较自由松散。同样在《九尾狐》、《海上繁华梦》等为代表的一批上海狭邪小说中,通过林黛玉、胡宝玉、张玉书、陆兰芬等一批妓女,把上海十里洋场“妓馆之多甲天下”的情况揭示出来。这些小说的情节大大淡化,但是对于妓女这个群体日常生活的描画却具有充足的史料价值,客观上反映出近代上海的都市化进程。“一品香”等番菜馆的涌现、彩票的发行、跑马会的喧嚣、万国珍珠会的主办、张园的开园游艺及其热闹,这些背景内容都是小说的重点。类似的还有陆士谔的小说《新上海》,学者们认为这是他写得最好、最有代表性的一部“社会小说”,套用他的夫人李友琴在该书序中所说的:“此编于上海之社会、上海之风俗、上海之新事业、上海之新人物,以及大人先生之种种举动”,“竭力描写,淋漓

尽致”(陆士谔 1)。显然在小说中嬉笑怒骂地讽刺各种时事怪现状是其主要目的,并不以故事情节的曲折取胜。

其次在叙事角度上更加灵活多变。古代小说多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通常也称之为上帝视角,有学者评价曰:“这种叙事方式还是保留了古代‘说书人’讲述故事的痕迹,它可以自由地介绍作品中任何一个人物的生活经历,也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描写广阔的生活场景,剖析人物的心理活动”(郭延礼 55)。但在近代以来,受到翻译小说的影响,一些都市小说在叙事角度上开始突破说书体小说以第三人称叙事的单一格局,尝试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虽然艺术上可能还显得不够成熟,但毕竟带着向现代小说转变的色彩。例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以“我”(九死一生)的经历和见闻为线索来组织故事,写到了上海、广州等都市中商人、买办、赌棍、讼师、道士、江湖医生、诗人才子、斗方名士、人口贩子等形形色色的人,以及发生在这些人身上的各种怪事,凸显出官场腐朽昏暗、社会道德败坏的现状。另外在《冷眼观》中也通过“我”的眼睛,对上海租界中骗术风行、官商勾结以及洋人蛮横等情况有所揭露。这种叙事人称上的改变可以让读者觉得小说中写到的故事更加真实。此外在近代小说中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还出现了一些灵活多变的样式。例如自传体、日记体、书信体等这些以特殊的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説,开始突破以往按情节发展叙述故事的线性模式,选择按照人物内心的变化来组织情节,凸显都市中人物复杂的情感。可以说这些尝试让近代都市小说在叙事角度上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且这些探索对后来的小说创作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例如到了现代文学中丁玲创作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心理描写细腻而著称,在艺术技法的使用上就更加纯熟了。

在近代小说城市书写中还尝试使用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它跟我们古代习惯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有所差异,是在借鉴西方小说的一人一事贯穿始终的布局技巧的基础上,运用中国传统的笔法,尽量把故事纳入主人公的视野之内,由此形成近代小说家独特的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典型的如小说《上海游踪录》中,写湖南书生辜望延被诬为革命党,弄得家败人亡,孤身走上海,小说因此就从他的视角出发,来描绘当时上海滩的真实情状。

如何评价近代小说城市书写的小说史意义,正如有学者在评价“小说界革命”口号下产生的这批“新小说”时所说:“这一代作家没有留下特别值得夸耀的艺术珍品,其主要贡献是继往开来、衔接古今。值得庆幸的是,谁要是想探讨中国现代小说与古代小说的联系与区别、研究域外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以及中国小说嬗变的内部机制,都很难绕开这一代人”(陈平原,“二十世纪”23)。我们对于以广州、上海为代表的近代小说城市书写的小说史意义也应作如是观。这些小说可能总体艺术成就并不算顶尖,但作为承前启后的一段,它们在城市书写由传统轨道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有着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价值,它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都在现代都市小说中得到了延续,这就是它的小说史意义。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 [Chen, Pingyuan. *A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in 20th Century*. Vol. 1 (1897—1916).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9.]
-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 [———. *Transformations of the Narrative Modes in Chinese Fic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 郭延礼:《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 [Guo, Yanli. *The Collis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Modern Literature*. Jinan: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1999.]
- 海上漱石生:《海上繁华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Haishang Shushisheng. *Blooming Dreams in Shangha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1.]
- 韩邦庆:《海上花列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 [Han, Bangqing. *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2.]
- 姬文:《市声》,《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11册。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
- [Ji, Wen. *Voices from the City. Chinese Modern Rare Fictions*. Vol. 11. Shenyang: Chunfe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7.]

(下转第210页)

- Lévi-Strauss, Claude.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Trans. Claire Jacobson and Brooke Grundfest.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63.
- McRobbie, Angela.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5.
- Morris, Charles W..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 Chicago and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
- Ogden, C. K., and I. A.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23.
- Peirce, Charles S.. *Collected Papers*. Vol. 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 Petrilli, Susan. *Sign Crossroads in Global Perspective: Semiotics and Responsibility*. Ed. John Deely.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0.
- Poster, Mark. "Critical Theory and Technoculture: Habermas and Baudrillard." *Baudrillard: A Critical Reader*. Ed. Douglas Kellner.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Ltd, 1994. 68–88.
- Ullman, Stephan.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 New York: Barnes & Noble Inc., 1962.
- 汪正龙 "论文学的指称——超越分析哲学视野的文学表意路径考察", 《文学评论》3 (2011): 26–31。
- [Wang, Zhenglong. "On Reference of Literature: Beyond the Literary Signification in the Approach of Analytic Philosophy." *Literary Review* 3 (2011): 26–31.]
- (责任编辑:王嘉军)

(上接第 135 页)

- 陆士谔:《新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 [Lu, Shi'e. *New Shangha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7.]
- 旅生:《痴人说梦记》,《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 15 册。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 年。
- [Lv, Sheng. *Tales Told by an Idiot. Chinese Modern Rare Fictions*. Vol. 15. Shenyang: Chunfe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7.]
- 遽园:《负曝闲谈》,《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 17 册。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 年。
- [Qu, Yuan. *Casual Talks When Basking. Chinese Modern Rare Fictions*. Vol. 17. Shenyang: Chunfe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7.]
- 孙逊 "海派文化: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先行者",《江西社会科学》5 (2010): 7–13。
- [Sun, Xun. "Shanghai-Style Culture: The Forerunner of Urban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5 (2010): 7–13.]
- 孙逊 刘方: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5 (2007): 160–70。
- [Sun, Xun, and Liu Fang. "Urban Writ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and Their Modern Interpretatio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5 (2007): 160–70.]
- 王韬:《瀛壖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 [Wang, Tao. *The Bund Magazine*.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9.]
- 袁行霈 陈进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上海卷》。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
- [Yuan, Xingpei, and Chen Jinyu, eds. *A General Survey of China's Regional Culture: Shanghai Volum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3.]
- (责任编辑:程华平)